

契丹文字文献论著解题(上)

于宝林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都做过重大的贡献。有的民族在很早的时代就创造了文字，并用这些文字记录了重要的历史事实和思想、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成果。我们如能有计划地将其发掘、整理出来，这将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呵！一般地说，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古代文献散失情况比汉文文献更为严重，仅存的文献尤显珍贵。

由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创造的契丹文字就属于这一种情况。下面，我们就现存的契丹字文献（主要是金石铭刻），以及对其的著录、记载和研究论著逐一作出解题。

契丹最早见载于《魏书》，主要活动在辽河上游老哈河和西喇木伦河一带。公元十世纪初，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逐渐强大，继而建立起在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辽王朝（这个政权也间或称“契丹”）。辽先后与中原五代、北宋抗衡，1125年亡于金。部分遗民西迁，在新疆一带建立西辽，西辽于1218年为蒙古所灭。辽的强大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就称“中国”为“契丹”，哥伦布也正是为寻访“契丹”而发现了新大陆；至今，在一些国家的语言中（如俄语、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语）仍用“契丹”一词的变音称呼中国。

文化的发展往往是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至。契丹原无文字，以刻木为信，在其势力扩展以后，尤其是907年称帝建国以后，为适应急促发展的政治、军事、经济新形势的需要，在先进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契丹字先后创制了两种：一种叫“契丹大字”，据《辽史》卷二记载：“（神册）五年（920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另一种叫“契丹小字”，制字年代不详，《辽史》仅记辽太祖弟迭剌“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卷六十四）。现存的契丹字文献资料也有这两种类型。在我国北方民族中，契丹民族首开制字之先河，此举对周围民族影响很大，女真文字就是直接在契丹文字的基础上创制的。

契丹文字制成后，在我国北方地区行用了近三百年，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诏罢契丹字”（见《金史》卷九）以后，遂废。明清以降，逐渐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了。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契丹文字文献资料，见诸史籍的只有北宋王易《燕北录》中所录符牌和旗帜上的六个字（又收入元陶宗仪所编《书史会要》一书中），其余都是金石铭刻，这些铭文大部分是在本世纪发现的。对于这些稀世珍品，在解放前，一些外国掠夺者曾覬覦外运，幸未得逞，解放后，又有不少新的发现。现存的契丹文字文献资料，除个别小器物外，其大件碑刻全部收藏在国内各地，我们有责任，也有条件对其进行很好的整理和研究。

研究契丹文字，解读契丹字文献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大家都知道，《辽史》是我国二十四史中最简陋的一部，内中错误很多，特别是契丹族人名和专用名用汉字转写时漏误不少。解读契丹字则可用第一手材料弥补辽代史料的缺略。另外研究契丹字对语言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都有重要的意义，契丹民族的源流至今不甚清楚，这就与契丹语言系属不明有直接的关系。

研究契丹文字的规律，解读契丹文字文献，是本世纪二、三

十年代方兴的一门专业。因为解读难度很大，日本有的学者将其称为“二十世纪之谜”。

笔者从七十年代初着手收集契丹文字文献资料和有关研究著作，每获见一书一碑，或抄录，或墨拓，或照相，并对照原物精心校勘。即读，遂记内容提要 and 心得体会，日积月累，已将现有资料和著作几尽网罗，为飡索要，现整理出来，供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参考。

本“解题”分三大类：金石墨迹、汉籍记载、现代论著。其中最后一类又予汉文、蒙文、日文、俄·西文部分分别叙述，所收论著截止1982年底。

金 石 墨 迹 类

契丹字书籍全佚，今存契丹文字文献资料主要是金石碑刻和题记墨书，有大字、小字两种，现分别介绍如下（未确认是契丹文字者暂不录）。

（一）契丹大字文献资料

1. 静安寺碑

静安寺座落在现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南，碑亦立于此。其寺早湮，碑尚存。原碑未确记所立年月，从碑铭中看，大致在辽道宗咸雍八年（1075年）。该碑碑额题“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碑正面刻的是汉字，背面刻契丹大字，因风蚀过甚，字迹漫漶不清，今日观之，几乎一字不能辨。1935年，日本人山下泰藏曾调查过此碑，他在《满蒙》第16年第10号上发表了契丹字碑文的拓本片断，据此我们可以辨出90多字。这虽是发现最早的一块契丹大字碑刻，因文字不清，又无人能识，以致长期以来未能得到人们的重视。

2. 故太师铭石记

墓主人情况不详，有人推测是耶律盆奴，不确。墓志出土情况不详，志石亦不知下落，拓本仅见于1942年《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3号，为李文信先生所著《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一文^①所附。此墓志为一合，志盖刻“故太师铭石记”六个汉字，志文刻契丹大字40行，约有1800字。这是迄今所见契丹大字石刻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可惜所发表的拓本字迹不甚清楚，给辨认造成很大困难。

3. 萧孝忠墓志

墓主人萧孝忠，死于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年），终官静江军节度使，此非《辽史》所载之萧孝忠，可补史缺。此墓志于1951年夏出土于辽宁省锦西县西孤山，原藏锦州博物馆，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墓志为一合，志盖正面无字，背面刻汉字12行，230字，志文刻契丹大字18行，约有500字。此墓志不仅是解放后契丹大字资料的首次出土，又因为以前《静安寺碑》文字漫漶不清，《故太师铭石记》又被李文信先生误指为赝品，这二碑石未能在学术界引起充分地注意和展开研究。直到此墓志出土，人们才真正得知契丹大字的真面目，故往往以此石刻为契丹大字的典型，所谓“西孤山墓志式契丹字”即指此。对契丹大字进行解读，也是由阎万章先生研究此志铭文开始的。现在，只能释出一些年号、干支、数字和年月日等。

4. 耶律延宁墓志

墓主人耶律延宁（946—985年），官至羽厥里节度使^②。该墓志于1964年冬在辽宁省朝阳县五家公社石片大队柏树沟村附近的柏木山辽墓中出土，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志文上半部刻契丹大字

^① 该墓志是契丹大字，李氏当初将其认为小字。

^② 据《契丹国志》卷22所载，于厥国（即羽厥里）在蒙古里（即蒙古）以北。《辽史》卷37载：“静边城……北邻羽厥”。羽厥里大致在今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一带。

19行，约有270字，下部刻汉字24行，511字，契丹字和汉字两者不对译。

5. 辽太祖墓碑残石

辽太祖姓耶律，名亿，字阿保机，小字啜里只，是辽代开国皇帝，907年称帝，916年始建元“神册”，在位二十年，天显元年（926年）七月歿，谥“升天皇帝”，后加谥，至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谥为“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葬祖陵。祖陵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西三十公里处的深山中，陵上建筑现已荡然无存，而房屋倒塌的堆积和碑刻残石还四处可见。解放后经多次调查，已收集到大小不等、刻有契丹大字的残石10块，共约78字，汉字残石9块，约25字。在这些残石中所存字虽不多，而石刻的字体非常工整，可谓契丹大字的典范。残石现分存在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巴林左旗文化馆。

6. 辽上京残石

辽上京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解放后，在龙门外和小新庄等地调查，发现了刻有契丹大字的残石两块，其中一块残石的正面、背面都刻有契丹大字，正面残存10行，约有64字，背面文字磨灭不清，仅能辨出4字。另一块残石正面残存文字8行，约有52字，背面无字。所刻字体都很工整。此二残石现存巴林左旗文化馆。

7. 应历刻石

此石出土情况不明，现亦不知下落。中央民族学院贾敬颜先生早年在旧书店购得一份拓本，其余未见所闻，此拓本殆为海内孤本，堪称珍贵。石刻契丹大字16行，约有392字。据刘凤翥同志研究，石刻中有“应历”年号。在其它情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估暂以此命名。碑文内容还待进一步解读。

8. 北大王墓志

墓主人耶律万辛（972—1041年），重熙四年（1035年）被封为北大王，《辽史》无传。此墓志也可称为《耶律万辛墓志》。

该墓志于1975年冬在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乌森伊合生产队沙日温都地方的一座辽墓中发现。其物现存该旗文化馆。墓志为一合，志盖正面刻“北大王墓志”六个汉字，背面刻有汉字21行，志文刻契丹大字27行，有789字。此墓志刻字工整，字数较多，有利于对契丹大字的规范。通过近年对志文的研究，已释出内中“开泰”“太平”“应历”“重熙”等年号。

9. 白塔子铜镜

此镜于1958年夏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塔子古辽庆州遗址处发现。边款刻有5个契丹大字。镜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10. 上京银币

该币于1977年5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附近辽上京遗址处发现，现存该旗文化馆。银币正面有4个阳文契丹大字，是原铸的，背面有8个阴文契丹大字，每两个字成一组，这是后刻上去的。据刘凤翥和王晴同志考证，银币正面4字为“天朝万顺”。

11. 铜币三枚

此三枚铜币出土情况不明，原币也不知下落。其一曾为绍兴周氏购得，拓本载于《艺林月刊》53期（1934年5月），中央民族学院贾敬颜先生亦藏有拓本，观其所铸文字与上京银币同，只是钱币的个体稍大；其二拓本亦存贾先生处，所铸文字亦同，只文字顺序相异；其三拓本存辽宁民族研究所金启琮先生处，所铸文字与上京银币全同。

12. 印章

各地收藏的印章很多，现经辨识出的契丹大字印有十九颗。即：①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出土铜印，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②1964年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河南营子东台村出土铜印，现藏昭乌达盟文物站；③1965年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出土铜印，原印下落不明，巴林左旗文化馆王青同志处藏有印样；④1966年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白音沟出土铜印，情况同

③；⑤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塔子出土铜印，现藏昭乌达盟文物站；⑥辽宁省凤城县出土铜印，现藏辽宁省博物馆；⑦辽宁省建昌县出土铜印，现藏辽宁省博物馆；⑧原东北博物馆所藏铜印，出土情况不详，现藏辽宁省博物馆；⑨1937年吉林省洮南县狐里营子出土铜印，原印不知下落，印样见日本人泷川政次郎所著《辽金的古城》；⑩吉林省博物馆藏印，出土情况不详；⑪吉林省博物馆藏八角印，出土情况不详；⑫河北省围场县出土铜印，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⑬天津艺术博物馆藏铜印，出土情况不详；⑭1952年新疆沙雅发现的铜印，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⑮1958年新疆伊犁发现的铜印，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⑯元帅右都监印，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处；⑰罗福颐先生所藏印样之一，原印下落不明；⑱罗福颐先生所藏印样之二，原印下落不明；⑲1980年辽宁省岫岩县出土铜印，现藏该县文化馆。观此印样，与日本人今西春秋早年所藏一印相同，只是后者印背刻有契丹字。据阎万章考释，印背文字是“统和廿二年五月×日”。

13. 铜牌四枚

①黑龙江省阿城出土铜牌，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该牌正面、背面皆铸有契丹字，正面4字，背面2行，约18字。②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文物站所藏铜牌，正面所铸最后一个字与阿城铜牌相同。③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文化馆藏铜牌，正面铸人头像，背面铸契丹大字3行，约有28个字，其中不少字与阿城铜牌相同。④成吉思皇帝圣旨牌，早年出土于原热河省某地，现存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该牌正面刻有两个契丹大字，其义为“走马”。

14. 太付太太银匙

此匙于1956年5月在辽宁省建平县朱碌科乡王福沟屯西北处的一座辽墓中出土，现藏辽宁省博物馆。该匙把上刻有9个字，前4字是汉字“太付太太”，后5字是契丹大字。

15. 特门石崖墨书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茂都公社特门石崖上有契丹大字墨书，因年久浸剥，勉强能辨出3行约12字。

16. 阿贵洞墨书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乌兰哈达公社四家子大队附近的阿贵洞外壁上有契丹大字题记，仅能分辨出7字。

(二) 契丹小字文献资料：

1. 兴宗哀册

辽代共传九帝，兴宗是第七代。名耶律宗真，字夷不董，小字只骨。太平十一年(1031年)继位，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歿，谥“神圣孝章皇帝”。葬于庆陵(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塔子附近)。民国初年，庆陵被掘，一位名叫凯尔(L.Ker)的比利时传教士闻讯前往，他于1922年6月21日在墓中首次发现了用契丹文字刻写的皇帝和皇后的哀册，可惜的是他不会制作拓片，遂雇人手抄，费五日之功抄竣，据凯尔的记述，录毕，仍将原石置原处，以土掩埋，然而，自此以后，此哀册再未发现，这个手抄本竟成为唯一宝贵的原始资料了。据以后的学者研究，凯尔所抄录的契丹字石刻是辽兴宗和仁懿皇后的哀册。这就是著名的契丹文字哀册发现之始，这个发现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日本岛田好称为“洵世界之大发现”(《林西辽陵石刻出土记事》)，江上波夫说是“考古学上、历史学上、语言学上的重大发现，为东洋学上的大事件”(《东洋考古学》)；稻叶君山云：“可称为世界的惊异”(《契丹小字碑文》)。契丹字自明清以降，既湮于世，无人可识，包括赵岫、钱大昕、王昶等著名学者皆把契丹字《郎君行记》碑视为女真字，并言“一字不能辨”。自此哀册的发现，人们方见契丹字真貌，从而纠正了几百年来将女真字视为契丹字的舛误，不少学者纷纷对其展开了研究，逐渐形成一个专业。据我们统计，兴宗哀册刻契丹小字36行，共861字。

2. 仁懿哀册

仁懿皇后为辽兴宗后，姓萧，小字挹里，重熙四年(1035年)立，号“贞懿慈和文惠孝敬广爱崇圣皇后”。辽道宗继位，尊为皇太后，大康二年(1076年)歿，谥“仁懿皇后”，葬庆陵。此哀册发现情况见“兴宗哀册”条。此哀册手抄本最早刊布于《北京天主教会杂志》(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第十年(1923年)118号上，以后《辽陵石刻集录》、《庆陵》等书均有转载。计刻契丹小字32行，575字。另有汉字哀册，两者不对译。

3. 道宗哀册

道宗是辽第八代皇帝，名耶律洪基，字涅邻，小字查刺，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继位，寿昌七年(1101年)歿，谥“仁圣大孝文皇帝”，葬庆陵。自凯尔在庆陵发现契丹字兴宗和仁懿哀册后，这个消息触动了当时身为热河省主席的汤玉麟，他由儿子汤佐荣组织人力于1930年再次挖掘庆陵，这次挖掘收获甚丰，共掘出了圣宗及两个皇后的汉字哀册，辽道宗及宣懿皇后的契丹字哀册、汉字哀册计有十五方之多。这些稀世珍品，在解放前险流国外，几经沧桑，现除契丹字道宗册盖断裂外，其余全部完整地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中。据统计，契丹字道宗哀册册文刻小字37行，1134字。经苏赫同志考证，其撰者为耶律固。契丹字册盖是用篆体按原字分刻，有6行，36个原字，这一现象对我们认识契丹小字很有意义，它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契丹字也有篆体，这是一种艺术书体。第二，契丹小字由原字组成，在某种情况下，可分原字书写。除契丹字哀册外，还有汉字道宗哀册一合，两种文字哀册互相不对译。

4. 宣懿哀册

宣懿皇后为辽道宗后，姓萧，小字观音，重熙年间纳为妃，清宁初年，立为懿德皇后，大康初年，被诬，赐自尽，乾统初年，昭雪，追谥：“宣懿皇后”，迁葬庆陵。此哀册发现情况见“道宗哀册”条，册盖情况和哀册撰者亦同。册盖刻契丹原字4

行，16原字，册文刻契丹小字30行，620字。另亦有汉字哀册一合，两者不对译。

通过半个世纪以来学者对以上四哀册的研究，已能解读出不少的专用词汇。

5. 萧令公墓志（残石）

此墓志据我们研究，知其墓主人是萧富留，故亦可称其为《萧富留墓志》。该墓志于1950年5月在辽宁省阜新县清河门西山村（清河门当时属义县）出土，这是解放后首次出土的契丹文墓志，原石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墓志出土时已残成四大块和一些小碎块，可辨出志文有32行，字缺较多，现存有594字。因该墓志石质不好，时间越长，石面剥落越厉，殃及文字，新拓本不如旧拓本，据我们所见，以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早期拓本为最佳。

6. 许王墓志

墓主人姓氏不详。该墓志于1975年在辽宁省阜新县卧凤沟公社的流井沟地方出土。有志盖和志石两块。志盖中部刻楷体汉字“辽国许王墓志”六字，左边刻“掩闭日甘露降”六个汉字，右边刻有与此对译的六个契丹小字。我们知道，契丹字解读的最大困难是极缺乏有可识文字相对译的材料，今所见资料中，只有此志盖的六个字和《郎君行记》碑文是与汉字互为对译的，故此盖对解读契丹文字具有特殊的价值。此志志石四面全刻字，左侧刻5行汉字，其余三面均刻契丹小字，正面30行，右侧4行，背面30行，共64行，这块墓志原来所刻字数比现存字数最多的《萧仲恭墓志》还多，可惜出土时已残去两角，现存计有2163字。左侧5行汉字记载了一些职官名称，据此可考墓主人身世，亦可作为解读契丹字的参考。

7. 故耶律氏铭石

据研究，墓主人为耶律挾不也，故亦可称为《耶律挾不也墓志》。该墓志于1969年夏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山咀子公社毛不沟地方出土，现存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志盖刻“故耶律氏铭

石”六个汉字。志石刻契丹小字25行，共699字。通览契丹小字金石资料，大都以行书体书写，字体很不统一，而契丹字至今还大部不识，如何判定契丹字字形，也是目前研究契丹字的课题之一，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此墓志所刻契丹字笔画较其它的工整，这就有助于对契丹字字形的整理。

8. 郎君行记

此刻全称，依碑额应是《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文刻在陕西省乾县附近武则天陵前的无字碑上。撰者是王圭和黄应期，记载天会年间金太宗的弟弟（据钱大昕考证为撒离喝）游猎并修饰陵上建筑一事。碑文前刻契丹小字5行，有97字，后刻汉字6行，108字。此碑早在明代《石墨镌华》一书中即有著录，清代金石著作中论及者更多，皆云“一字不能辨”，以碑刻于金代而讹认为女真字，由是而知，契丹字从明代以后就成为世人所不识的“死文字”了。这帧碑刻至今保存完整，其最突出的学术价值是所刻契丹字和汉字互相对译，近代很多研究者解读契丹字往往从此碑入手，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此刻所解读的契丹字也最多。

9. 郎君行记（残石）

1982年10月，我们前往乾陵考查无字碑时，在陵前朱雀门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块刻有契丹小字的碑石，石已残缺，仅存其右上角，约原石的1/4。经辨识，内容与无字碑上所刻《郎君行记》相同，连字的笔画、大小、行款都同。据调查，碑石原在陵下司马道村，是一个姓白的家作房基用，群众称为“金兀术的石头”，1980年乾陵博物馆的同志将其移置陵上，然始终不知上面刻有文字，直到我们发现，碑石方作为珍品收藏于乾陵博物馆。此碑与无字碑上所刻为什么完全一样？孰为原刻，孰是复制？均有待研究。

10. 萧仲恭墓志

此墓志经王静如先生研究，知墓主人是萧仲恭。萧仲恭，

《金史》有传，本名术里者，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年)生，其母为道宗之女。初仕辽，辽亡归金，授世袭猛安，天德二年(1150年)歿，谥“贞简”。墓葬在今河北省兴隆县梓木林子村。该墓在1942年即为当地人挖开，墓志弃置原地无人过问，解放后始被保护，1972年运往保定，由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收藏。志盖有契丹小字3行，共9字，志文有契丹小字50行，2442字，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保留契丹文字字数最多的一件刻石，文中详载了萧仲恭的身世，足可补史之缺。

11. 庆陵壁画题字

辽庆陵除出土了著名的契丹字帝后哀册外，在其东陵内的不少壁画上还书有一些契丹小字的题记，这些壁画现已不见，日本鸟居龙藏、田村实造早年曾对壁画作过详细的考查，并将壁画照片收于《辽之文化图谱》和《庆陵》两书中，集中起来，可辨识出50余字。

12. 木槨壁面题字

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广德公公社曾出土一木槨，壁面彩绘，上有契丹小字墨书，依稀可辨有22字。此物现藏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

13. 圆铜镜

镜背铸契丹小字7行，28字，不少研究者以为是一首七言绝句，但还未释读出。此镜因不藏于国内，未能亲见原物，1912年出版林泰辅所著的《朝鲜通史》上载有该镜的照片，云所藏“李王家博物馆”，而未言所出；1916年罗振玉先生所编《古镜图录》收有该镜的文字拓本。

14. 完颜通铜镜

此镜成等边八角形，每边长9.5厘米，镜背铸有契丹小字5行，16字。镜缘阴刻“济州录事完颜通”字样，可知是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至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之间所刻字，据《金史》记载，这一时期曾改黄龙府为济州，以后又改为隆州。

该镜于1971年6月在吉林省大安县红岗公社永合大队小学校出土。现存吉林省博物馆。

15. 宝坻镜

此镜为等边八角形，每边长5.6厘米。镜背环铸4个契丹小字，镜边阴刻“宝坻官”字样。该镜是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文化馆郑瑞峰同志在废品收购站发现，购得后捐献国家，现存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对照起来，这面铜镜与罗振玉先生1916年在《古镜图录》中所收录的契丹字八角镜一样，而罗氏早年收藏的铜镜文字拓本已不知去向。另外，朝鲜总督府1919年出版的《朝鲜金石综览》一书，曾载一铜镜文字的摹本，文字摹得很蹩脚，云其所藏为“本府博物馆”，看其字，也与此镜相同。

16. 寿昌钱

此钱环铸4个契丹小字，字形与宝坻镜背所铸字同，只是顺序不一样。该钱出土情况不详，其物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17. 三彩釉瓷砚和黄釉笔洗

此砚和笔洗是一套，早年出土于四方城，现物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上有契丹小字墨书，今已模糊不清，勉强可辨出7字。

18. 鱼形符牌二枚

此二符牌原物均不知下落。其一，在罗振玉先生1914年9月所编的《历代符牌图录》中收有拓本，注为“蒋氏藏”。上刻契丹小字1行，5字。其二，在罗氏1925年冬出版的《增订历代符牌图录》中载有摹本，黄浚先生1935年所编的《衡斋金石小录》中收录了拓本和器物照片。上刻契丹小字2行，字迹不甚清楚，约有7字。

19. 玉盞

据罗福颐先生在《契丹国书管窥》一文中介绍：“此玉盞原藏清内府，乾隆初即出土，以此盞有乾隆御题诗可证。今盞藏美国人福开森氏。铭刻杯底。”现在刘凤翥同志处藏得一份文字拓本，乃罗福颐先生所赠。此盞盞底文字的摹本曾收录在《辽陵石

刻集录》一书中，取书与拓本对照，摹本有误。此盞底所刻契丹小字是按照原字分刻，共2行，11个原字。在契丹小字资料中，像这样按原字分刻的情况，仅见于道宗、宣懿哀册的册盖和《故耶律氏铭石》第一行下面的几个字，这再一次表明，契丹小字是可以分解为原字的。

20. 白塔题记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郊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塔内壁上至今还保存着金元明各代的题记墨迹，其中在第五层的东西壁上发现了契丹小字题记两处，经辨识，一处有契丹小字4行，31字，另一处3行，34字，其中有意为“大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契丹字，可见是金代所题。

21. 巴拉哈达洞壁墨书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附近巴拉哈达山洞内有契丹文字墨书多处，经实地考察，可辨出70余字，中有意为“大康三年四月十三日”的契丹小字，可知是辽代所书。

22. 乌兰哈达石崖墨书

在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乌兰哈达公社西南四公里的石崖上还有一些契丹小字墨书，因年久剥失，已不好分辨，只能勉强看出几字。

古籍记载类

浩瀚的史籍只给我们保存下寥寥的六个契丹大字的字样，至于契丹小字一个也不见，也没有一部专门论及契丹语言文字的书籍。虽然如此，只要我们究心搜集，在散于各类典册之中，还是可以发现不少重要的历史史实，从不同角度上记载了有关契丹语言文字的情况，这些情况对今天研究契丹文字，解读契丹文字文献也是必需的。现一并胪列于后，供读者参考。为了便于读者查找，所录史籍，除解放后重新刊行者外，其余皆标注诸版本情况。

1. 王溥（北宋）：《五代会要》30卷。中华书局195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溥（922—982年），字齐物，祁县人，五代时为后汉进士，入宋后官至右仆射，《宋史》有传。本书修成于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是以当时所见旧史及累朝实录为本，分类编辑而成。该书卷29“契丹”条下有关契丹制字的记载，这是见于史籍中契丹制字情况的最早记载，多为以后所本。另外，该卷还记载着后唐天成三年（928年）七月“王晏球又获契丹绢书二封来进，明宗命宣示群臣，莫有识其文字者”。说明契丹文字制成后即在外交上行用。

2. 欧阳修（北宋）：《新五代史》74卷。中华书局1974年12月版。

修（1007—1072年），字永叔，庐陵人。《宋史》有传。该书卷72“四夷附录”有关契丹制字的记载，与《五代会要》所记大同小异。

3. 王易（北宋）：《燕北录》1卷。锦囊小史本，宋人百家小说本，宛委山堂刊说郛本。

易（1004—1081年），字悌卿，开封人，曾于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年）出使契丹。该书则为奉使契丹沿途所闻。书中载有见到用契丹字书写的旗帜和用契丹字刻的符牌，并画下符牌式样和上面刻的契丹字，又摹下旗帜上写的契丹字，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史籍上唯一保存下来的六个契丹字。弥足珍贵。据后来学者研究，是为契丹大字。另外，在该书中还记录了一些契丹语汇，这也是研究契丹语文的重要资料。

4. 刘攽（北宋）：《中山诗话》1卷。百川学海本，津逮秘书本，历代诗话本，四库全书本。

攽（1023—1089年），字贡父，新喻人。《宋史》有传。本书在当时称为《刘贡父诗话》，现名恐系后人所拟。书中记载了一首北宋使臣余靖（字安道。1000—1064年）用契丹语和汉语交

杂戏作的诗，并对诗中的契丹语词注明汉义，这首诗虽用汉字写成，但内中保存的契丹语汇资料，对今天语言资料极缺的契丹语来说，是很宝贵的。《宋史》余靖传曾说：“靖三使契丹，亦习外国语，尝为番语诗”。然而，在《宋史》本传中和余靖所撰的《武溪集》中却未见载这首诗。

5. 沈括（北宋）：《梦溪笔谈》26卷。此书解放后出版过四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年木版线装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梦溪笔谈》校正本；中华书局1957年新校正《梦溪笔谈》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元刊《梦溪笔谈》本。

括（1029—1081年），字存中，钱塘人。《宋史》有传。括也曾使契丹。在这本书中卷25记载了一则刁约（字景纯，？—1082年，曾两使契丹）用契丹语和汉语交杂的四句诗。对诗中的契丹语词注有汉义，这又是一帧珍贵的契丹语言资料。该书卷15还有一条重要的记载：“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死”。从中可窥见契丹当时的文化政策。

6. 彭乘（北宋）：《续墨客挥犀》10卷。明刊本，说库本，宛委别藏本，涵芬楼秘笈本，弢园丛书本。殷礼再斯堂丛书本。

是书原刊作者不详。阮元《擘经堂进书录》定为彭乘。只知彭氏是筠州高安人，事迹不可考。据本书卷4称宋神宗（1068—1085年）为“今上”，知为当时人。该书所存续集10卷。正、续集内容皆记录宋代轶事及诗话文评。在续集卷8“诗纪契丹事实”条下录有刁约北语诗。据查与《梦溪笔谈》所录同。

7. 阮阅（北宋）：《诗话总龟》前集48卷。明月窗道人刊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阅，字闳休，苏州人，事迹不详。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称，在宋高宗时以中奉大夫知袁州。本书原名《诗总》，又名《百家诗话总龟》。书成于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这部书以搜采旧事、遗篇为主，在该集卷2“博事门”条下录有余靖

北语诗，所录与《中山诗话》中的记载在个别字上有出入，而其内容是一致的。

8. 洪迈（南宋）：《夷坚志》。现存207卷，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

迈（1123—1202年）字景卢，鄱阳人。《宋史》有传。本书书名取自《列子》：“夷坚闻而志之”语意，故此书杂录旧闻琐事、神话仙怪等。原书收罗广泛。卷帙浩翰。据《直斋书录解題》云有420卷，是宋代著名的志怪小说集。今大部已佚。所存已非原书编次，在今传本丙志卷18中刊有“契丹诵诗”一则，材料虽短，非常宝贵，这是史籍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可以窥见契丹语语法关系的材料，从其所记可以看到契丹语的语序是与汉语不同，而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语相类。

9. 叶隆礼（南宋）：《契丹国志》27卷。元刻本，四库全书本，承恩堂刻本，扫叶山房本，宋辽金元别史本，国学文库本。

作者生卒年不详，号渔林，嘉兴人，官国子监簿。是书为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奉诏撰成，该书杂采诸篇，删繁别冗，因多有不当之处，史家诸责其失。然其成书在《辽史》之前，收录不少辽代遗事，仍不失为研究辽代的重要资料。在该书卷1和卷23皆记载有契丹制字的情况。其中卷1所载与《辽史》相左，据考，《辽史》载确。另外，该书卷7有辽圣宗用契丹字译书的记载；卷24录有余靖和刁约的北语诗；卷25张舜民《使北记》有关于契丹字银牌的记载。这些记载对研究契丹字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0. 陈振孙（南宋）：《直斋书录解題》22卷。聚珍版本，巾箱本，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苏州局本，杭州局本，南昌局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作者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人，终官侍郎。陈氏藏书甚丰，据传累至五万余卷，他着此书录解題，为世所崇。此书久佚。今

本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书卷5记载：“《辨鵙录》一卷，不著名氏，契丹译语也，凡八篇”。这本书早已不知下落，仅在此见其书目，契丹字研究者多有提及，故录之。

11. 周密（南宋）：《齐东野语》20卷。胡文壁刊本，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说库书，宋人小说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密（1232—1298年），字公谨，先世为济南人，故书名曰“齐东”，宋理宗时曾官义乌令，宋亡弃官。这本书保留了很多宋代轶闻旧事，历来为史家所崇，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说：“宋末说部可考见史事者，莫如此书……自较他书为可信”。这本书卷16“北令邦”条下录有刁约北语诗。

12. 彭大雅（南宋）撰、徐霆（南宋）疏：《黑鞑事略》1卷。藜照庐丛书本，六经堪丛书本，问影楼舆地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蒙古史料校注本，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本书撰、疏者皆为宋理宗时人，曾奉使蒙古，各撰其风土习俗，继而合为一编，以彭撰为纲，徐撰为疏。在本书的徐疏中记有：“契丹、女真诸亡国者祇用汉字……契丹、女真原自有字，皆不用”。据王国维考证，徐霆出使蒙古当在宋理宗端平初年，相当蒙古窝阔台七、八年，并云徐霆“颇得事实”。这条记载很重要，可以看出契丹字自金章宗罢废以后，很快就停止了使用。

13. 陈准（南宋）：《北风扬沙录》1卷。宛委山堂刊说郭本。

作者情况不详，考其内容为南宋时所著。书中杂叙女真旧事、习俗等。其中有记：“（女真）与契丹言语不通”。这个记载也很重要。西方学者早年研究契丹语言皆以为属通古斯系，可见与事实不符。

14. 耶律楚材（元）：《湛然居士文集》14卷。宗仲亨刊本，胡氏重刊本，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渐西村舍汇刊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楚材（1190—1244年）字晋卿，燕京人，《元史》有传。为辽东丹王八世孙、金尚书耶律履之子，元太宗时官至中书令，元文宗时追封为广宁王，谥文正。楚材学识广博，在其文集卷8载有一首《醉义歌》，据其序云，此歌原为辽朝寺公大师用契丹文所作。楚材在随军西征的过程中。见到西辽前郡王李世昌，向李习契丹文，遂将此歌译成汉文。可惜的是契丹原文《醉义歌》没有保存下来。

15. 李志常（元）：《长春真人西游记》2卷，道藏本，道藏举要本，道藏精华录本，重刊道藏辑要本，指海本，连筠篲丛书本，榕园丛书本，宛委别藏本，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本，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志常（？—1318年）字浩然，号真常子，道号通玄大师。长春真人，姓邱，名处机，为志常之师。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长春真人率弟子十九人前往西域，三载而归，志常也在此行，是书乃记沿途经历，于山川、路程、人物、风俗所载颇详，是一部重要的史地著作。在该书卷上记载着：行至今蒙古中部一带，见一古城址，“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元初去辽不远。想还有人能辨契丹字，而该书未录字样，后人不知其形，实为憾事。

16. 脱脱（元）：《辽史》116卷。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

《辽史》是我国“正史”之一，修于元顺帝至正年间，由中书左丞相脱脱主其事。由于仓促成书，失之简漏，这在二十四史中也是很突出的。然观辽代著作，传至今者极少，该书保存了不少辽代史实，亦可称贵。在这本书中未录一个契丹字，但对研究契丹字的背景材料所记颇多，远胜于他书。其中卷1、卷64、卷75、卷76、卷89、卷103等多处记载了契丹字的创制和颁行情况；卷2、卷10、卷57、卷72、卷89、卷103载有有关契丹字刻石、记碑、译书等情况；还多处记录了当时通习契丹字的一些人

名；最末一卷“国语解”集中收录了契丹语汇材料。这些都是研究契丹文字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17. 脱脱（元）：《金史》135卷。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本书修成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无论从材料和编制方面，皆在《辽史》之上。该书卷51、卷53、卷66、卷73、卷99等载有有关金初沿用契丹字，以及在契丹字影响下创制女真字的情况。尤其卷9明载明昌二年（1191年）“诏罢契丹字”。这些材料都很珍贵。

18. 杨允孚（元）：《滦京杂咏》2卷。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元诗选本，元诗纪事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作者字和吉，吉林人，生卒年不详。该书作于元亡之后。滦京即元大都（今北京）。该书收诗108首，所记元大都轶事颇详。据该书卷上有一首诗中云，作者曾在京郊弹琴峡见到石崖上有辽金文字的墨迹。

19. 陶宗仪（元）：《书史会要》9卷。上海古籍书店1979年印本。

作者字九成，黄巖人，生卒年不详。《新元史》和《明史》皆有传。这本书成于明初，专述历代书法。其中卷8有关制契丹字的记载，考其内容，与《新五代史》所载同。重要的是，在该卷中录有5个契丹字的字样，并注有汉义。不少后世的契丹文字研究者以为这是仅存的契丹字形，遂广为引用。据考，此5字就是《燕北录》所录符牌上的几个字，只是将笔划摹为正书而已。

20. 张鼎思（明）：《琅琊代醉篇》40卷，万历刊本，日本刊本。

作者字慎吾，安阳人，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书跋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书名：“代醉篇”，取欧阳修醉翁亭之义。张氏在该地著此书以代酒乐。是书杂抄诸史百家，其中卷35录有余靖和刁约的北语诗。

21. 赵崑（明）：《石墨镌华》6卷，赵氏刊本，学古斋本，知不足斋本，艺圃搜奇续集本。

作者字子函，周至人，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举人，书成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书名取自《文心雕龙》诂碑篇“石墨镌华”句。作者的家乡近汉唐故都，多古刻，作者经心搜访，积30余年，以成是书，该书卷6录有《郎君行记》碑文，此碑今虽在，然以著录而论，是书最早。赵氏录后云：“是碑一字不能辨，盖女真字”。由此可见当时人已不识契丹字，将其误认为女真字。这个误解一直影响到明、清两代好几百年，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辽陵契丹文哀册出土方告冰释。

22. 李光暎（清）：《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16卷。雍正刊本，道光刊本。

作者字子中，嘉兴人，生卒年不详。书刊于雍正七年（1729年）。该书是作者得朱彝尊所藏金石刻本后，广罗补充，并辑诸家之论而成。书中卷15有“皇弟经略郎君行记”条，然未录碑文，仍误认为是女真字。

23. 汪师韩（清）：《韩门缀学》5卷，续篇1卷。乾隆刊本，上湖遗集本，丛睦汪氏遗书本。

师韩（1632—1705年），字抒怀，钱塘人，雍正进士，曾主讲莲池书院。其书名即取《唐书》：“韩门弟子”之语。该书内容为考证经史，在其续篇“清文鉴”条下谈及《郎君行记》，不仅将上刻契丹字误认为女真字，并据《金史》有关女真大、小字的记载，将其推论为“女真大字”，这个说法，直接影响到契丹字的研究，同时，也给以后的女真大、小字之争开了先河。

24. 金门诏（清）：《补三史艺文志》1卷。中华书局1955年2月刊《二十五史补编》本。

门诏（1672—1751年），号东山，江都人，乾隆进士，官寿阳知县。是篇是从作者文集卷3中抄出来的。辽、金、元三史皆缺艺文志，金氏为之作补。其中补辽志中，记有用契丹文字所译

书，有《五代史》、《通历》、《贞观政要》、《方脉书》等四种书目，原书现已不见。此书目亦是从《辽史》中抄出来的。

25. 厉鹗（清）：《辽史拾遗》24卷。四库全书本，振绮堂本，苏州局本，广州局本，五省官书局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鹗（1691—1754年），字太鸿，号樊榭，钱塘人，《清史稿》有传。史家多病《辽史》疏漏，厉氏极毕生精力，博采群书三百余种，仿裴注《三国志》例，对《辽史》既注又补，工程可谓空前。书中辑补有关契丹语文的情况如下：卷1契丹制字（据《书史会要》）；卷15契丹字旗和牌（据《燕北录》）；卷24刁约、余靖北语诗（据《梦溪笔谈》和《中山诗话》）；末一卷“国语解补”收集了不少契丹语汇。

26. 李奉翰（清）：《永平府志》24卷。乾隆刻本。

奉翰（？—1797年），汉军正蓝旗人。《清史稿》有传。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任永平府知府时总裁修是书，历时两年书成。实际主修的是王金英（字菊庄，乾隆举人）。在该书卷末“杂记”条下收录了一段《染庄社记》，注为录自金代至宁元年（1213年）兴平路猛安蒲察孟里所记，此记记录了一个名叫“胤莪”人的故事，故事本身无可取，而人名甚异，后世不少人认为是契丹字，也有人认为是汉字误写，现还不能断定，仅记于此。

27. 周春（清）：《辽诗话》。本书前后出了两种，一种为初稿本，1卷，作于乾隆丁丑年（1757年）；一为增订本，2卷，作于乾隆壬午年（1762年）。前者有松霭初刻本，周松霭先生遗书本，昭代丛书本，清诗话本；后者有述古丛钞本，藏修堂丛书本，翠玻璃馆丛书本，芋园丛书本。

春（1729—1815年）字范兮，号松霭，海宁人，官岑溪知县，《清史稿》有传。辽向无诗集，散于诸书之诗亦鲜见，周氏广采史籍200种成此书。其中初稿本中收有刁约、余靖北语诗和《永平府志》所录《染庄社记》，作者认为其怪异名字是汉字误写，在增订本中，除仍载上述内容外，增加了《燕北录》关于契

丹字牌和《书史会要》关于契丹制字的记载。

28. 赵翼（清）：《陔余丛考》43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中华书局1963年版。

翼（1727—1814年），字云崧，号瓯北，阳湖人，《清史稿》有传，是乾嘉时代著名的考据学家。该书卷24录有余靖、刁约北语诗。

29. 赵翼（清）：《廿二史札记》36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中华书局1963年版。

此书为清代著名的考史著述。李慈铭云，非赵氏所著（见《越縕堂读书记》），然观其所据，不足定案。无论谁著，无损本书的价值。该书卷29简述了契丹制字的情况。

30. 毕沅（清）：《关中金石记》8卷，焦氏刻本，经训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沅（1730—1799年）字秋帆，镇洋人，《清史稿》有传。是书为其任陕西巡抚时所作，其中卷7录有《郎君行记》汉字碑文，对上刻的契丹字误云：“为女真书”。

31. 和珅（清）：《热河志》120卷。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辽海丛书本，右文阁本。

和珅（？—1799年）姓纽祜禄，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清史稿》有传。是书为奉敕撰，刊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其中卷82提及《静安寺碑》，云：“碑字漫漶不可读”，据后人调查，碑阴刻有契丹字，然是书未录碑文，实为可惜。

32. 钱大昕（清）：《潜研堂金石文跋尾》20卷，潜研堂全书本。

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嘉定人，《清史稿》有传。钱氏是清代第一流的大学问家，以博精著称。据称家藏拓本八百余篇。他依此著成跋尾一书，内容以考史为主，其中卷18录有《郎君行记》碑文，对碑中汉字部分考证精详，对契丹字部分亦误云“为女真字”，再无多言，可见清代已

无人再识契丹字了。

33. 钱大昕（清）：《补元史艺文志》4卷。中华书局1955年2月刊《二十五史补编本》。

是书附见辽、金。在其“译语类”载有契丹字译书四种，与金门诏所载同。

34. 杨复吉（清）：《辽史拾遗补》5卷，振绮堂校刊本，苏州局本，广州局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复吉（1747—1820年），字列欧，吴江人，乾隆进士，家富藏书，文行为当时所重。厉鹗补《辽史》时，《旧五代史》还未辑出，所补有漏，杨氏为之再补。该书卷4收有《永平府志》所载《染庄社记》，又录有契丹字译书四种。

35. 王昶（清）：《金石萃编》160卷。经训堂本，同治修补本，扫叶山房本。

昶（1724—1806年），字德甫，青蒲人，《清史稿》有传。王氏极毕生之精力撰成是书，嘉庆十年（1805年）成书时年已82，翌年即卒。是书搜罗宏富。起上古至辽金，收碑1500余种，不仅尽录碑文，还附历来考证，可为金石学之大著。该书卷154录有《郎君行记》碑文，文后有各家考证，然仍将其误认为“女直书”。

36. 吴騫（清）：《愚谷文存》14卷。嘉庆刊本，拜经楼丛书本。

騫（1733—1813年），字槎客，海宁人，乾隆末贡生。吴氏笃嗜典籍，遇善本，倾囊购之，筑拜经楼，藏书数十万卷。吴氏这本文集以书跋为多，间考金石，其中卷5记有“书金都统郎君行记双钩本后”一则，指出：“《石墨镌华》中摹刻其文，多舛错谬”。言是。书中又言：“余尝从周芑兮大令借得金搨碑双钩本”，然未录其文，不知是何拓本。

37. 沈赤然（清）：《寄傲轩读书三笔》6卷。嘉庆刊本，五研斋全集本。

赤然（1746—1816年）字韞山，仁和人，乾隆举人，官丰润知县。据自序云：“丙寅（1806年）冬，老境寂寥，以书送日，偶有所见，复随意草数条，至丁卯春抄，已积百余纸，遂分为六卷”。在本书卷5提及契丹字，仅云：“契丹、西夏、金、元皆有国书”。可见当时人们对契丹字早已陌生，不知历史上曾创制过契丹字的人也不在少数。

38. 凌扬藻（清）：《蠡勺编》40卷。岭南遗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扬藻（1760—1845年），字药洲，番禺人，乾隆诸生。这本书是作者的读书札记，多直录古今之说。该书卷24录有《寄傲轩读书三笔》的记载。

39. 翁树培（清）：《古泉汇考》8卷。清抄本。

树培（1764—？），字宜泉，大兴人，乾隆进士。在该书卷6中提到《郎君行记》时云：“每一字以两三字合成，有如琴谱”。这是观察到了契丹小字的组合形体特征。然仍将其误认为完颜希尹所制的“女真大字”。

40. 张金吾（清）：《金文最》120卷。粤雅堂本，苏州局本。

金吾（1787—1829年），字慎旃，昭文人，道光诸生，好藏书，据称累至八万余卷。张氏有感于冯清甫《集金文》书佚，积十二年之勤，辑成此书。取名“最”者，乃《公羊传》“会最”之义。该书卷28收有《染庄社记》（录自《永平府志》）；卷65收有《郎君行记》（录自《石墨镌华》）。另外，在卷首由英和作的序中提出，《郎君行记》中所记的“皇弟”是“世祖养子萨甲干也，而《金史》本传不载”。

41. 海忠（清）：《承德府志》60卷，道光刻本，光绪刻本，民国刻本。

作者字靖堂，满州正红旗人，生卒年不详，官热河兵备道。该书是其任知府时总纂而成，道光十年（1830年）刊。该书卷20

载《静安寺碑》，录有碑阳汉文，未录碑阴契丹字。

42. 俞正燮(清)：《癸巳类稿》15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正燮(1775—1840年)，字理初，黟县人，《清史稿》有传。这本书是作者的札记，道光十三年(1833年)辑成。该书卷7曾提及契丹文字制字的情况。

43. 刘师陆(清)：《女真字碑考》1卷，附续考。道光刊本，又收入《考古社刊》1936年第5期。

作者字子敬，洪洞人，生卒年不详，善金石之学。该书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刊行，在续考中论及《郎君行记》，并与女真字《宴台碑》对比，他认为，《郎君行记》所刻是女真大字，《宴台碑》所刻是女真小字，从而引起区分女真大小字的争论。直到百年后才弄清，《郎君行记》不是女真字，而是契丹字，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女真字只有《宴台碑》上所刻的一种类型。由此可见，由于当时不识契丹字真貌，不仅给考证契丹字带来舛误，也给认识女真字造成混乱。

44. 麟庆(清)：《鸿雪因缘图集》3集。道光精刊本，点石斋本，小方壶舆地丛钞本。

麟庆(1791—1846年)，字见亭，长白人，《清史稿》有传。该书为作者一生的游记，晚年汇成。其中第2集载有“宴台访碑”一则，对比论及《郎君行记》，对刘师陆关于区分女真大小字一说表示赞赏，其实谬也。

45. 李鸿章总裁、黄彭年总纂：《畿辅通志》300卷。光绪刊本，北洋官报石印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本。

彭年(1823—1890年)，字子寿，贵筑人，《清史稿》有传。参加编修这部书的有80多人，彭年总其成。书中卷142记有《静安寺碑》，然而对其背面的契丹字仍是只字未提。

46. 李有棠(清)：《辽史纪事本末》40卷。历朝纪事本末本，纪事本末汇刻本，李氏移鄂楼本，同文局本。

有棠(1837—1905年)，字芾生，萍乡人，官峡江县训导。

是书虽是《辽史》的纪事本末体，然所采并不限于《辽史》，曾参阅上百种古籍，对史事进行了考订，在卷1的考异中引了一段《纪异录》（据《永乐大典》）关于契丹制字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说法在制字年代上与《辽史》所记不同，前者记为天显元年，后者记为神册五年，李氏在书中只是指出了矛盾，未加考证，而据后来人的考证，还是《辽史》的记载是对的。

47. 叶昌炽（清）：《语石》10卷。自刻本。

昌炽（1847—1917年），字鞠棠，长洲人，光绪进士，官至甘肃提学使，《清史稿》有传。本书专论古今石刻，宣统元年（1909年）刊行。书中卷8提及契丹制字的情况；也语及《郎君行记》，仍误称为是“女真字”。另外，该书还提到：“契丹书最少，潘文勤师曾得一双钩本，笔划繁重，如以汉字两、三字合成一字，余也响拓得一通，置篋中，无能读者”，很明显这不是《郎君行记》，而究竟是什么，不得而知。

48. 缪荃孙（清）：《辽艺文志》1卷。中华书局1955年2月刊《二十五史补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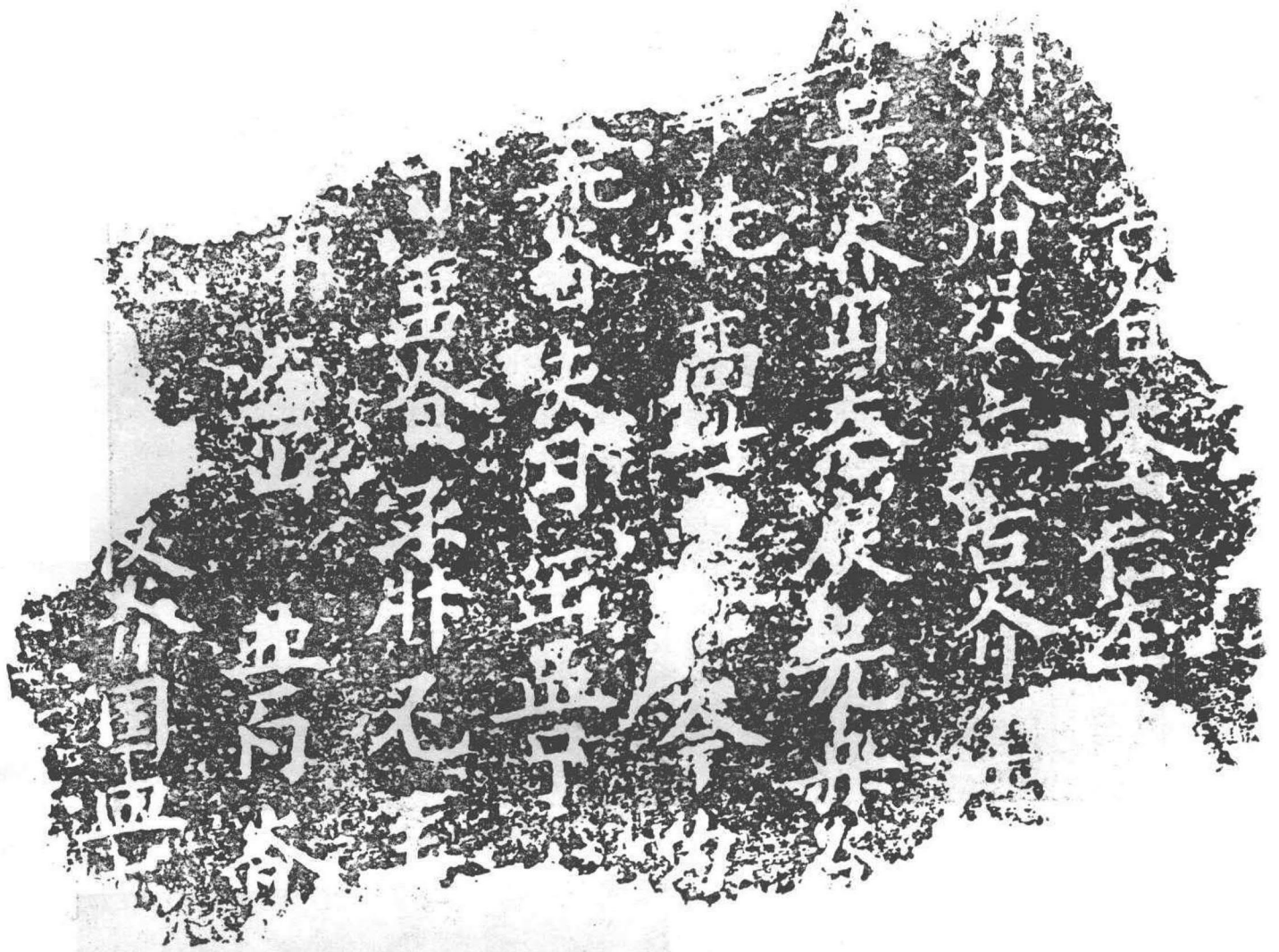
荃孙（1844—1919年），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江阴人，光绪进士，少习经学、小学，后究心金石、目录之学。是书专辑辽代书目，其中有契丹字译书四种，所记与金、钱二氏同。

49. 王仁俊（清）：《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中华书局1955年2月刊《二十五史补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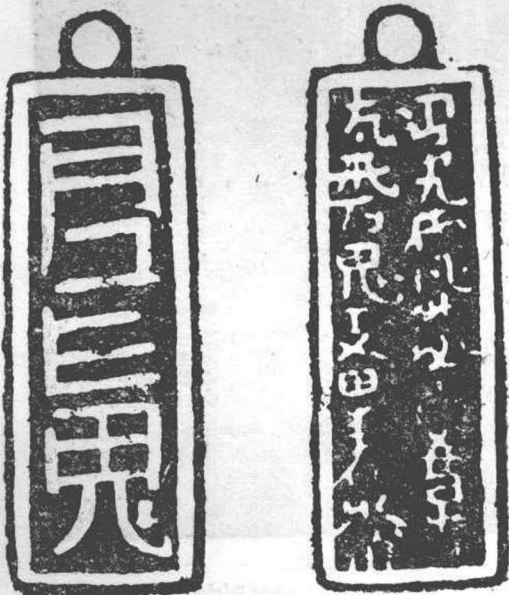
仁俊（1866—1913年），字扞郑，吴县人。王氏对以往诸家所辑辽艺文志详加标注，又增补30余种，对契丹字译书比前人多补一种。

50. 黄仁恒（清）：《补辽史艺文志》1卷。中华书局1955年2月刊《二十五史补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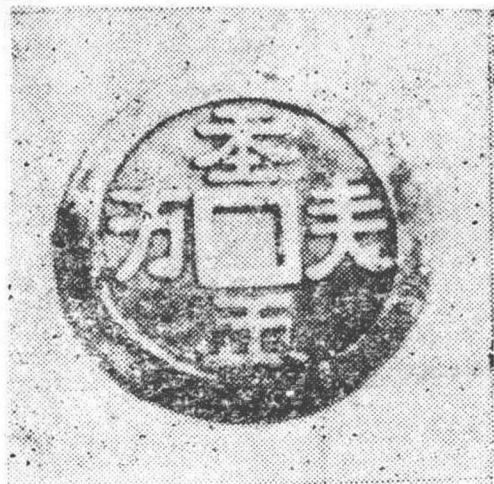
作者字秩南，南海人，生卒年不详。该书在诸家补辽艺文志最后，因感“诸家之采录，或略或滥，未臻完善”而作（见书叙）。是书所辑契丹字译书最多，有7种。



契丹大字《辽上京残石》



契丹大字铜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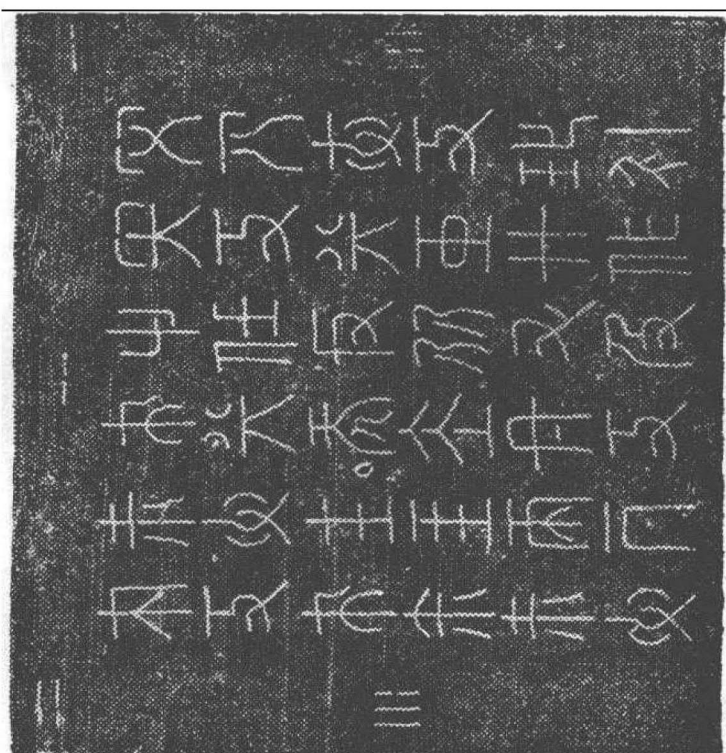


契丹大字
辽上京出土银币

契丹小字，汉字合璧《郎君行记》碑记



契丹小字《宝坻镜》



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